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2, 2026, pp. 204–215.**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0219msrrv**

HIEP
Academic Publishing

# 海上丝绸之路与通俗文学的兴起

**薛海燕（Xue Haiyan） 耿晓晴（Geng Xiaoqing）**

**内容摘要：**通俗文学的兴起，是文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而海上强国的崛起，又是开启世界近代史的一把钥匙。那么，海上国际交流的增强，与通俗文学的兴起，二者之间有无重要的内在关联？海上国际交流（广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三个历史阶段中，出现通俗文学繁荣现象的国度恰恰正是当时在海上国际交往中占主导作用的国家。这样的对等关系，说明通俗文学的发展与海上丝路的繁荣，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由二者共有的“主体间性”特征所决定的。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通俗文学；兴起

**作者简介：薛海燕**，女，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电子邮箱：haiyanxue.111@163.com。**耿晓晴**，女，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电子邮箱：gxq091011@163.com。

**Title: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 Rise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rise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is a key indicator of literary modernization, while the emergence of maritime powers has served as a crucial key to unlock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of world hist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enhanced maritim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the rise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Across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of maritime international exchange—the broad framework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nations that witnessed a flourishing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were precisely those that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maritim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their respective eras. Such correspondence suggests an inseparable link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vernacular literature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his connection is fundamentally determined by their shared characteristic of “intersubjectivity.”

Received: 05 Apr 2026 / Revised: 13 Sep 2026 / Accepted: 27 oct 2026 / Published online: 10 Nov 2026 / Print published: 10 Dec 2026.

**Keywords:** Maritime Silk Road; vernacular literature; rise; intersubjectivity; maritime exchanges

**Author Biographies**: **Xue Haiyan**,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holds a Ph.D. in literature.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haiyanxue.111@163.com. **Geng Xiaoqing** is a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gxq091011@163.com.

近代学术有一个重要判断：通俗文学的兴起，是文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而治近代史者同样会有另一个判断：海上强国的兴起，是开启世界近代史的一把钥匙。我们不免好奇，海上国际交流的增强，与通俗文学的兴起之间，有无重要的内在关联？毕竟，《小说的兴起》等名著，就是把海洋历险小说的出现，当作近代小说史的开端或重要地标来看待的。

## 一、文学通俗化与国际交流海洋化乃至整个社会近代化往往同步

近代学术转型的标志之一，即在传统文学谱系中，强调通俗文学的价值，白话文学的价值。文学史学科初创的三大经典：《宋元戏曲考》《红楼梦考证》《中国小说史略》，无不以通俗文学为研究对象。

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①]（王国维 671）后来学者又在这个描述后面加上了一个词：“明清小说”。

大家可以发现，在上述发展链条上，越到后面，通俗性、白话特征就越强。可以说，文学史走的是越来越通俗、越来越白话的道路。即便没有西方文学的影响，自身的发展趋向也是逐渐走向通俗化。

文学通俗化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社会结构与知识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逐步推进的。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文人雅集到市井说唱，从抄本流传到刻本风行，每一次传播媒介的革新都推动了文学向更加广泛的受众群体敞开。印刷术的发明与推广尤为关键：宋代以降，坊刻本大量出现，话本、平话等通俗读物借助商业印刷迅速传播，使得文学不再是士大夫阶层的专属品。这种传播方式的变革，与海上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城市发展密切相关。海洋贸易所催生的港口城市，如明州（宁波）、泉州、广州等，不仅是商品集散地，也成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活跃场所。

而国际交流海洋化与文学通俗化两种现象之间的伴生、同步特征，则突出表现在海上国际交流繁荣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都曾不约而同出现过通俗文学崛起的独特局面。比如在由古希腊、迦太基、古罗马先后主导的古代地中海霸权（公元前—公元五世纪）时期，曾出现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梵剧；由阿拉伯帝国、宋明王朝主导的中世纪区域海权（5–15 世纪）时期，曾出现欧洲流浪汉小说、阿拉伯民间文学、唐宋传奇、宋元戏剧、宋明话本及章回小说；而由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先后主导的大航海时代全球霸权（16–19 世纪）时期，则出现了欧洲近代小说的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个阶段中通俗文学的兴起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与各自时代的社会变革深

度交织。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古希腊戏剧的繁荣与雅典海上同盟的扩张几乎同步，而古印度梵剧的成熟则与贵霜王朝依托海上丝路积累的物质财富密不可分。在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海洋贸易网络覆盖了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广阔水域，《一千零一夜》等民间文学经典正是在巴格达、开罗等国际贸易中心逐步成型。与之对应的是，宋元时期中国沿海港口城市成为戏曲和话本的重要发源地。在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远洋探险催生了大量冒险叙事，而荷兰和英国的海洋霸权则直接推动了近代小说的兴起，从《堂吉诃德》到《鲁滨逊漂流记》，海洋经验构成了通俗文学最重要的题材来源之一。正如美国学者伊恩·瓦特所指出的，“novel”一词以“new”为词根，本身就暗示了近代小说与海外拓展之间的深层联系（瓦特 23）。

不难发现，以上三个阶段中，出现通俗文学繁荣现象的国度更恰恰是当时在海上国际交往中起主导作用（或起部分主导作用）的国家。这样的对应关系，是否能够说明，通俗文学的发展与海上丝路的繁荣，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事实上，海上丝绸之路所促进的交流远不限于商品层面。有学者指出，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促成了三个层面的跨文明互动：物质流动（陶瓷、香药、书籍等）、人的流动（商人、僧侣、使者）以及思想的流动（信息、制度、技术、文化习俗、宗教等）（李广志 128）。正是这三个层面的交流相互叠加、彼此激荡，为通俗文学的兴起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物质流动带来了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人的流动带来了异域故事和多元视角，思想的流动则催生了新的文学主题和表达方式。通俗文学的兴起，正是这三个层面交流汇聚后的文化结晶。

进一步而言，海上丝绸之路所促成的文化现象，远比物质层面的商品交换更为深远，其中与通俗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莫过于宗教传播对文学叙事的深刻塑造。佛教经海路传入中国，不仅带来了佛经本身，更携带了大量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譬喻文学。这些故事以其情节曲折、想象奇幻的特点，深刻影响了中国志怪小说和唐代变文的创作。六朝志怪中“月光王施首”“须大拏太子”等故事，明显脱胎于佛教本生经；而敦煌变文更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蓝本，将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说唱文体，成为通俗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往来于海上丝路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也带来了以《一千零一夜》为代表的故事体系。其中“辛巴达航海记”等篇章，本身就是海洋冒险与商业冒险的文学化表达，其“框架套故事”的叙事结构对东南亚乃至东亚口头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宋元以后，基督教传教士经由海路抵达东亚，其携带的宗教文学作品和翻译实践，又在更大范围内刺激了东亚通俗文学的发展。宗教故事的本土化过程，实质上就是通俗文学不断吸纳、转化、再创造的过程。

语言接触与词汇融合同样是海上交流在文化层面的重要表征。海洋贸易所催生的人际交往和物质交流，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大量外来词汇。仅以佛教传入为例，“波罗蜜”（pāramitā）[②]、“琉璃”（vaiḍūrya）[③]、“茉莉”（mallikā）[④]、“菩提”（bodhi）[⑤]、“刹那”（kṣaṇa）[⑥]等梵语音译词大量进入汉语，这些词语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更带来了全新的文化意象和思维方式。它们逐渐融入日常表达，进而进入文学创作，为通俗文学提供了新的修辞手段和意象资源。翻译文学对本土文学的刺激同样不可忽视。从佛经翻译到近代西学东渐中的文学翻译，每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都伴随着文学语言和叙事方式的革新。佛经翻译创造了“四言为主、长短相间”的白话文体，直接影响后世的变文、话本乃至明清小说的语言风格。而在港口城市形成的双语乃至多语环境，则进一步促进了文学表达方式的多元化和通俗化。

海上交流还深刻改变了文学的审美趣味。异域风物的涌入，激发了文人和市民对“奇”“异”之美的强烈追求。这种审美趣味的变迁，在文类层面有直接反映：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中大量出现海外异国、奇珍异物、异域人物的描写，与海上丝路所带来的域外见闻有着密切关系。《梁四公记》中描写的扶南奇物、《古镜记》中涉及的海外来客，都是海洋想象与文学叙事交融的产物。“志怪”与“传奇”这两个文类之所以在海上交流繁荣的时代特别兴盛，正是因为海洋经验为文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题材资源和想象空间。海外风物进入文学视野，不仅丰富了叙事的素材库，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一种对“他者”和“未知世界”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恰恰是通俗文学区别于精英文学的重要审美特征。

此外，海上交流还推动了知识体系的拓展，间接而深远地影响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从《山海经》中关于海外异国的想象，到大航海时代较为精确的世界地图，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经历了持续而深刻的演变。每一次地理知识的扩展，都为文学想象提供了新的边界和素材。《山海经》中“海外南经”“海外西经”等篇章所描绘的奇异国度，虽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却体现了早期中国人通过海洋认知外部世界的努力。宋代以后，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海外见闻录大量涌现，如赵汝适《诸蕃志》、汪大渊《岛夷志略》等，其中记载的海外风土人情、物产贸易，直接激发了小说、戏曲中异域题材的创作。“世界”概念从“天下”到“万国”的演变，不仅是知识层面的进步，更意味着文学想象空间的极大拓展——当作家和说书人知道“世界”远比“天下”更为广阔时，通俗文学的题材自然也就更加丰富多元了。

## 二、同步现象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

从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角度看，文学发展的通俗化、市民化，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剩余劳动力、剩余生产资源也就越丰富，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相应的，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会越来越高。这是需求侧对文学或文化发展所提出的要求。而从供给侧来看，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通俗文学繁荣所需要的创作或表演等专业化人才也就越多。总之，宋元时期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专业人才的增多，无疑给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发展成熟提供了温床。

具体来看，海洋贸易对城市经济和市民文化的推动作用尤为显著。以宋代泉州为例，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泉州汇聚了来自阿拉伯、波斯、东南亚等地区的商人，城市人口激增，商业活动空前繁荣。港口经济带动了周边服务业、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市民消费群体。这一群体对文化娱乐的需求，直接刺激了说唱、戏曲等通俗文艺形式的繁荣。类似的对应关系在欧洲同样明显：威尼斯、热那亚、安特卫普等海洋贸易城市，无一不是近代通俗文学的重要发源地。海洋贸易所创造的财富，不仅资助了印刷业的扩展，还培养了一个有购买力、有阅读需求的市民阶层。据统计，15 至 17 世纪，伦敦、阿姆斯特丹等海洋城市的印刷品产量增长了数倍，其中大部分为通俗读物，包括冒险小说、航海日志、民间故事集等。[⑦]

同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价值观也逐渐成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思想意识特点经由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文本的不同角色都能发声、整部作品“众声喧哗”的“杂语性”文本结构集中地得以呈现。而在此前，小说因其来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特点，而被列为“小道”或“九流十家”之末，只能是“残丛小语”或“短书”而很难成篇。而商品经济崛起的宋

元，则不止是戏曲的爆发期，也是小说的繁荣期。不提宋元话本，即使经常列为明代作品的章回小说“四大名著”的前三部，事实上也早在宋元时期已成熟或定型。而在此前，即便能出现唐张荐传奇集《灵怪集》中《钮婆》那样表达“皆是小儿，何贵何贱”等平等宣言的单篇，也很难想象会有“水浒”故事等敷衍造反传说的数百万字长篇，发展成为市民文学的饕餮盛宴。

值得深入分析的是，海洋经济与内陆农业经济在推动文学发展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内陆农业经济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财富积累缓慢，社会流动性低，文化消费主要局限于少数精英阶层。而海洋贸易经济则具有开放性强、资本周转快、社会流动性高的特点。海洋贸易不仅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封闭格局，带来了人员的广泛流动和信息的快速传播。商人在异域见闻基础上的口述、航海日志的刊行、翻译作品的流通，都为通俗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外，海洋贸易城市通常具有较为宽松的文化管控环境，这为通俗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通俗文学才得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小道”上升为“一代之文学”。

而众所周知，海洋贸易是近代社会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它不仅促进商品交换，更加速资本、技术、制度、思想的全球流动，能直接推动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航海叙事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海洋经验被转化为文学想象，参与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段波、张瑞影 106）。[8]在此意义上，文学通俗化或近代化之所以经常与国际关系的海洋化现象相伴随，主要是受经济基础决定律所支配的。

除经济因素外，海上贸易对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同样是理解这一同步现象不可忽视的维度。海上贸易因其高风险性和跨文化特征，催生了系统的海商法律体系。古希腊的罗德海法（Lex Rhodia）确立了共同海损等基本原则，中世纪的《奥列隆判例集》（Rôles d’Oléron）和《康索拉多海法》（Consolato del Mare）则进一步构建了海上贸易的契约框架。宋代颁布的市舶条例同样对海外贸易的税收、检验和纠纷处理作出了详细规定。这些法律制度的核心精神——契约意识和规则意识——对通俗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契约精神在社会关系层面的渗透，使得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关系更趋平等，故事的逻辑性和因果性显著增强。与此同时，海商法律文本的通俗化过程也与通俗文学的传播相互促进：法律条文需要以通俗语言向商人、水手等群体普及，而通俗文学则借助法律案例和海上纠纷题材丰富了自身的叙事资源。此外，海洋贸易中的风险分担机制——如合伙制（commenda）、海上保险等——所培养的冒险精神和风险意识，为通俗文学提供了重要的主题资源。从古希腊史诗中的航海冒险，到宋代话本中的商旅故事，再到中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商人传奇，海洋贸易所塑造的冒险叙事模式深刻影响了通俗文学的故事结构和审美趣味。

在政治制度层面，海洋贸易城市普遍形成了独特的自治传统和相对民主的政治体制。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体、威尼斯共和国和热那亚共和国的寡头共和制，以及宋代在主要港口设立的市舶司制度，都体现了海洋贸易对政治制度的塑造作用。这些港口城市在政治治理上表现出显著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与内陆农业社会的封闭性形成鲜明对照。古希腊城邦的戏剧节本身就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雅典民主政体为戏剧创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乃至经济支持，公民大会的辩论传统也直接滋养了戏剧的论辩性特征。威尼斯、热那亚等海洋共和国同样在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中孕育了繁荣的市民文化。宋代虽然总体上是中央集权体制，但市舶司制度下的港口城市享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度，加之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使得文化管控相对宽松，为话本、戏曲等通俗文学

的创作和传播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政治空间。相比之下，内陆农业社会以土地为本，强调等级秩序和社会稳定，文化管控往往趋于严格，文学创作更容易受到“文以载道”等传统观念的约束。

海洋贸易还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长期被视为不可逾越的社会分层。然而，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商人阶层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显著提升，这一传统秩序开始松动。在地中海世界，商业行会（collegia）和航海合伙人的组织形式赋予了商人群体一定的社会地位保障；在宋代泉州，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大商人不仅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能够参与地方事务，部分商人子弟还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行会制度和商会组织不仅为商人提供了经济互助的平台，还积极参与赞助通俗文艺活动，成为推动通俗文学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使得传统的“四民”界限日益模糊，士人经商、商人入仕的现象日趋普遍，这为通俗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视角和更为丰富的题材。商人的航海见闻、水手的冒险故事、工匠的技术知识，这些以往被精英文化所忽视的经验，开始进入文学创作的视野，使通俗文学呈现出更加开阔的叙事空间和更加鲜活的生活质感。

值得关注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还推动了知识传播制度的变革。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时期的“百年翻译运动”系统地将希腊、印度的科学和哲学著作翻译为阿拉伯语，宋代设立的译经院同样承担了大规模的佛经和外来知识翻译工作。这些制度化的翻译活动不仅促进了跨文明的知识交流，也为通俗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和思想资源。同时，书籍贸易的国际化也促进了通俗文学的跨国传播。港口城市往往也是书籍流通的重要枢纽，宋元时期泉州、明州等港口的书籍贸易已颇具规模，威尼斯和亚历山大港同样是地中海地区重要的书籍集散地。通俗文学文本在跨文化流通过程中不断被翻译、改编和本土化，形成了独特的跨文化传播网络。

## 三、同步现象出现的文学主体及本体根源

戏剧的“代言体”本质包含两个维度——动作模仿与空间模仿，其成熟与海上交往所催生的主体间性[9]意识密切相关。

戏剧的本质是什么？王国维认为是“代言体”。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戏剧的“代言体”本质：一是模仿，另一个则是模仿者（演员）与被模仿者（角色）之间的“主体间性”。

关于模仿，大家容易理解为动作模仿，即表演。这点没错，但大家容易忽略，表演还需要舞台，故而戏剧还有另一种模仿内容：即，空间模仿。以大家熟悉的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为例。

俄狄浦斯出生后，其生父忒拜王拉伊奥斯从神谕中得知他长大后将会杀父娶母，因而令人把婴儿抛到荒郊野外。仆人怜其无辜，把他送给科林斯的一个牧羊人。科林斯国王因为没有儿子，于是就收养了他。俄狄浦斯从神那里得知自己注定要杀父娶母，为了躲避厄运，就逃离了科林斯，可是万万没想到正是这种刻意的躲避加速了他人生悲剧的步伐。他离开养父母朝忒拜城走去，在逃离的路上受辱，一怒之下杀了四个人，其中就有他微服私访的亲生父亲——年迈的忒拜国国王拉伊奥斯。

很容易可以发现，没有空间的错位——俄狄浦斯被抱离父母之邦——神谕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也就是说，安排空间上的上述错位，是表达悲剧主旨的重要手段。而全剧悲剧主旨的主要内涵，也主要在于命运无所不在、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空间压迫感。该剧作者索福克勒斯生活在公元前 496 年至 406 年之间，当时是雅典民主制鼎盛时期。公元前 429 年至 427 年，雅典经历了两次瘟疫的侵袭（剧中瘟疫取材于此），促成了公民内心对民主和理性的怀疑，同时也希冀出现治疗神迹。索福克勒

斯借此重新诠释俄狄浦斯的故事，树立神明的权威，挽回宗教机构的声望，维护现有的先知体系与神谕体系，反对早期启蒙思想。从叙事手法上看，《俄狄浦斯王》用空间叙事否定了时间叙事：穷其一生，俄狄浦斯都无法逃离命运的安排。如果我们把时间叙事当做某种理性的、现实的元素，正像《奥德赛》中众人都凭自己与奥德修斯相处的记忆判断眼前所见是否奥德修斯本人、此类情节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意味着“从不知到已知的转变”、因此具有认识论上的“发现”意义；那么相应的，《俄狄浦斯王》的时空叙事方式在认识论上则具有回溯性、保守性的特点。

空间模仿需要相应的空间意识，而早期中国方位观对东、南方位的认识相对模糊。中华早期文明以西北黄河流域文明为主体，而其总体上以东、南为重心的发展格局，在魏晋南北朝初见雏形，到宋代才基本确立。上述历史进程，与文学史上由雅向俗、由文向白的发展进程，基本上是同步的；而南北朝或宋元时期，也正是戏剧发展史上的爆发期。

那么，主体间性的自觉或成熟，与海上国际交往之间又有何关联呢？或者说，海上国际交往的繁荣，为什么会促进主体间性意识的成熟？还是以产生古希腊戏剧或梵剧的时代背景为例。

古希腊悲剧大致繁荣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公元前四世纪初，恰好处在希波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两场大规模海洋战争之间。并非所有古希腊戏剧都直接反映当时的国际冲突，但亚里士多德所概括的古希腊剧场的“六大元素”[10]之一的思想（thought），与上述国际冲突所带来的古希腊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的重大变化之间，无疑有着深刻的联系。

许多人都知道雅典是民主政体。希波战争使雅典得以将主要矛盾由国内阶级矛盾转化为对外冲突，而提拉同盟则使雅典得以将维持民主体制及满足平民经济诉求所需的资金压力转嫁到其他同盟国身上。雅典综合国力及民主体制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在希波战争中，雅典吃尽了主导海洋国际关系的红利。而物极必反，公元前五世纪中期，随着波斯势力再度入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许多盟邦认为无必要继续缴纳贡金，开始退出同盟而雅典帝国在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沉重打击下最终落败。与帝国在对外扩张上利益一致的是日益富庶的雅典工商业者。相比之下，雅典的两个农业阶级（大土地所有者和普通农民）几乎没有直接分享帝国扩张的红利。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希腊戏剧中心只能出现在雅典，而不是在斯巴达或其他城邦国家。因为随着雅典工商业者的崛起，国内消费之风大盛；而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斯巴达政权“所采取的大多数政策总是以防范希洛特（即奴隶）为基础的”[11]（修昔底德 286），而不是什么海外扩张。事实上，斯巴达人根本无福消受任何侵略扩张所得：在斯巴达，一切奢侈都被禁绝，如果官员被发现有什么奢华的生活享受，就很可能被检举落马。上述对比也补正了一点，即：为什么古希腊戏剧能在雅典得以繁荣？这种繁荣现象的出现与海上国际交往的增强不仅几乎同步，而且确实有历史上的因果关系。

回到前面讨论的古希腊戏剧六要素之一的“思想”和我们所说的“主体间性”。古希腊戏剧大多取材于神话、英雄传说或史诗，而同时又根据现实问题对原有故事进行了改造。比如前文提到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其中主人公无法逃离命运的安排质疑了民主与理性，转而向神权致敬；而瘟疫有关情节的设计则不仅直接取材现实，而且有否定雅典国际扩张战略的客观倾向。

再如欧里庇得斯（前 485—前 406），他是雅典奴隶制民主国家危机时代的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一生醉心于哲学思考，其所处时代的各种政治或经济矛盾，如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新出现的城市富豪与贫民之间的矛盾、土地贵族寡头派与工商界民主派之间的矛盾、雅典集团与斯巴达之间的矛盾、甚至两性之间的矛盾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他的悲剧作品中得到反映。其《美狄亚》《特洛

伊妇女》等作，正是揭示以上矛盾（尤其是两性矛盾）的杰作。

以上剧作家对大规模海上国际交往所带来的新阶层（工商业者）的崛起及日渐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思考，增强了其作品的“间性特征”和思想性。

至于梵剧，相传希腊当时的马其顿国皇帝亚历山大东征时，曾带着一些戏剧用品到印度去，而印度雅语称“戏台上的幕”为“耶伐尼迦”，意思便是“希腊的”。当然，如果仅凭这些就判定梵剧起源于希腊戏剧，尚不足为据。但是，不可否认，梵剧在产生、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希腊戏剧的若干影响；正像中国戏剧在形成过程中曾受到来自梵剧的若干影响一样。重要的是，梵剧的成熟有赖于哪些因素？这些因素是否与海上国际交流有关？

公元初的一两百年间，南印度河、恒河流域由著名的贵霜王朝统治。其扩张资本主要源自当时海上丝路的新开拓。自公元一世纪晚期以来，罗马人、阿拉伯商人为了避开帕提亚主导的高税额陆路商贸，加大了对海路贸易的投资。一船船的西方和中东金银，从地中海沿着红海和印度洋季风航道，直接流入贵霜境内，从而促进了帝国的繁荣。包括迦腻色伽在内的几代贵霜国王，能在当地缺乏黄金的环境下，不断发行足量优质的金币，就是得益于从罗马输入的大量贵金属。创造了世界闻名（在西藏也有着巨大影响）的长诗《佛所行赞》的僧侣大诗人马鸣，正是贵霜帝国著名的倡导佛教的迦腻色迦王的御前诗人。而此时，恰恰是梵剧趋于繁荣的关键时期。至于梵剧在模仿（动作模仿与空间模仿）及主体间性等方面如何具备了繁荣的条件，篇幅所限，此处不再展开。

如果说戏剧的通俗化动力主要来自主体间性意识的自觉，那么小说的兴起则更多地与海上交往所带来的“新知”经验有关。

这里可参考英国学者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该书认为，“小说”在英文中原本表述为“fiction”，意为“虚构故事”；而十七、十八世纪后的“novel”一词，则以“new”为词根，表示新颖、创新、有新知之意，用来表达与资本主义相对应的意识形态。⑫不难发现，最能表现类似意识形态的，无过于描写海外拓展或历险的故事，如《鲁宾逊漂流记》《汤姆琼斯》等等。显然，在伊恩·瓦特看来，小说的兴起，与近代欧洲海权国家的崛起有关。

可以追溯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海神故事。不难发现，奥林匹斯山的主神们大都是某个城邦国家的保护神，而海神波塞冬被哪个国家敬奉为保护神呢？荷马史诗没有交代。据柏拉图记述，大约12000 多年前，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大西洋海域曾经有一个高度先进的古代文明——亚特兰蒂斯文明，相传亚特兰蒂斯人曾在大西洲中央建立首都，并用保护神波塞冬来命名这座城市。而随着亚特兰蒂斯文明的消亡，海神波塞冬沦为奥林匹斯山十二主神中唯一名下没有城邦或领土的一个，像一个被放逐或边缘化的“过气”主神，这就决定了他身上有某些非政治化、非贵族化的品格。所以在《奥德赛》中，他成了奴隶主、君王奥德修斯返乡旅程中最大的障碍。而被称为西方最早的海洋书写典范的《奥德赛》，也因描写了奥德修斯的儿子、妻子、仆人都能凭借眼睛辨识亲人，而不是盲从神谕的诸多细节，被称为真正具备了小说元素的文本，甚至被认为开启了西方现实主义创作的先声。从这点来看，早在古希腊时期，海上交流就已经表现出开创通俗文学的潜质。

中国小说之兴起，与海上丝路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

关于“小说”这个文类，最经典的界定当推《汉书·艺文志》中的概括（当然此段概括出自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⑬（班固1745）引文所强调的，其实是“小说”的传播方式：口耳相传，欠缺权威性、经典性及可信度。就

这样的传播方式而言，小说只能是一种通俗文类。与西方 fiction 或 novel 等概念不同，《汉志》强调的是小说的阶层属性、社会属性。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传播方式，还决定了小说文体的转述性特征，即：此种文体没有确定的出处，不强调创作权。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直到明清，小说已经成为所谓“一代之文学”，但甚至连《红楼梦》这样确实是由作者原创的作品，都没有明确署名，以致对于大部分古典小说，后世都很难考知确定的作者。

但同时，正与前文提到戏剧模仿所带来的“主体间性”特征相仿，小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传播方式，也带来了多元的话语及观念形态，从而造成了文本的间性特征。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杂语性”。这点非常有意思：尽管中国戏剧相对晚出，但小说却很早就已出现并成熟（即使从“作意好奇”的唐传奇开始算起，中国小说起步也不算晚）；富有间性特征的小说文体，很早就已成为通俗文学的重要样式。

中国小说为什么起步较早？这种现象与海上丝路之间又有何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样需要从探讨小说的本质谈起。小说的间性特征或“杂语性”，本质上决定了其不合于主流意识的思想倾向。换言之，像古希腊戏剧一样，小说也具有某种“思想性”。其实，伊恩·瓦特所强调的 new 这个词根为 Novel 所带来的，也正是题材与思想的新颖性，尤其在思想上，要求非常有创新性，非常有冲击力。否则仅凭题材的新颖，很难成为经典性的作品。

问题在于：来自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中国早期小说，连署名权都不加以强调，会去自觉追求所谓的思想性吗？

答案恰恰是肯定的。

大家很熟悉现存最早有关“小说”的论断，及《庄子·外物》中的一句话：“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⑭（郭庆藩 922）就是说，“小说”所表达的，通常是与所谓的“大道”不完全相容的价值观。东汉桓谭在《新论》中说：“若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词。”⑮“小说家”要编织“可观之词”，也不能没有自己的观念或立意；而且后者并不局限于“治身理家”的儒家立场，而是内涵更丰富。对于《汉志》存目的“小说”，常见说法是大多出自方士之手。王瑶认为：“张衡所言小说本自虞初的说法，也就是说，小说本自方士。证以汉志所列各家的名字和班固的注语，知汉人所谓小说家者，即指的是方士之言。”⑯（王瑶 110）。虽然“十五家小说”无法一以概之，至少后六家中的《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待诏臣饶心术》《虞初周说》《臣寿周纪》《封禅方说》等五家出于方士身份的待诏或侍郎之手。而方士们以方术安身立命，方术源出古代巫术,在演进过程中又不断吸纳了神仙说、阴阳五行、道家长生思想和儒家学说等。编纂于清代中期的《四库全书》囊括四部、收罗广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朝廷所认可的知识体系。一改前代小说收录入史部的惯例，《四库全书》将“小说”放进了子部，其中就有强调小说非事实而系观念类的认知；且其收录作品中大多为笔记体，传奇体则不予收录，具体标准为“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即言，不收在观念上另类的作品。

如上文所言，《汉志》“十五家小说”不少出自方士之手，而后者的知识储备大抵以阴阳家、道家或道教学说为主。不少当代学者强调过道家、道教学说与海洋文化（尤其是滨海的东夷文明）之间的关联。宋镇豪进一步指出，自夏朝开始，东夷文明就是中华主流文明的重要助推力量：“当夏人崛起于黄河中游时，最初的（夏禹）治水和水流东注的地理因素，最足以使人们对东方奥秘发生兴

趣。东方夷人发达的经济物质文化水平，在当时明显处于领先位置。……夏代的整个历史时期，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就是同东方夷人的社会交往或剧烈争斗。（宋镇豪 35）”虽然自三代至宋，中国政治基本可称为黄河时代的政治。但从早期东夷到春秋时期的吴越，再到三国孙吴、南朝各代，直至南宋，上述较强政权的存在对主流文明而言都不妨视为由东部沿海沿着黄河逆流而上的一种补充。更有甚者，它似乎预示着：主导中国未来政治地理走向的，必然将是自西之东的模式。

加之，东方是日出之地，先民们总是将东方作为承载美好价值理想的区域。像中国社会早期的五行方观念，东方对应于五行中的木、五色中的青、四季中的春，预示着一年农耕生活的开始，代表着春天般的温暖和希望。而存在于东方的大海，虽然有时也引起畏惧感，但同时也经常成为有待不断打开并最终需要达至的宏阔之境。

东方、沿海所承载的以上意蕴指向，使得人们对海上交往充满了积极、热情、浪漫的畅想。“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⑰（李白 163）先民们想象海外有仙山或仙境，想象有来自于海外的所谓秘方、秘药、仙丹。不少早期小说其实就是讲述到海外寻找不老神药的故事，不是直到唐代，大家还在传说杨贵妃到了海外仙山吗？神秘浩瀚的海洋，符合传奇的审美需求。早期唐传奇故事《古镜记》中，王度的弟弟王绩游历山水过程中，最诱人的经历之一，就是拿古镜照钱塘潮水，阻止海水向前推涌。《补江总白猿传》，欧阳纥在福建长乐丢失妻子，也是在沿海之地。《西游记》与这个故事之间有微妙的联系。而《柳毅传》故事中，如果没有急公好义、嫉恶如仇的钱塘龙君，整部传奇将减色不少（而钱塘君这个龙王，正是后世海龙王的雏形）。更不必说来自“海中洲”（其实很可能是东南亚）的“昆仑奴”身怀绝技、一身是胆；胸怀天下的“虬髯客”最终在海外实现了政治抱负。上述唐传奇故事中，“海外”都是构成“传奇”（即“新知”）的最核心的要素。

这里可以发现，与 Novel 这个词的“新颖”之意主要体现在内容（新鲜、奇特）与思想（有个性、有创新性）两方面相似，中国“小说”（尤其是“传奇”）也有以上两方面的追求。而同样，如上所述，中国小说在思想或内容两方面的对“奇”“异”的追求也与西方小说的兴起相似，与海洋经验或海上交流有一定关联。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其一，历史阶段不同。西方小说兴起于近代，而中国小说或传奇早在唐代已趋于成熟。其二，思想背景不同。西方小说之兴起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中国小说或传奇则主要承载非主流文化意识形态。

正像前面所强调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价值观也逐渐成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思想意识特点经由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文本的不同角色都能发声、整部作品“众声喧哗”的“杂语性”文本结构集中地得以呈现。此前，小说只能是“残丛小语”或“短书”而很难成篇。但是，没有这样的“残丛小语”或“短书”，没有收藏这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主体间性文本的习惯，也很难置办章回小说、明清传奇那种市民文学的饕餮盛宴。至于小说这样的主体间性文类为什么能在传统文献生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就需要另有专文加以分析阐明了。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Xue Haiy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7-4579-3461

Geng Xiaoqi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9-5294-9799

## 注解【Notes】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书店，1983 年，第 671 页。

② 波罗蜜（pāramitā）：梵语音译，全称“波罗蜜多”，义为“度、到彼岸”。东汉支娄迦谶般若译籍已见雏形，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使之定型流行。出自姚秦 • 鸠摩罗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8 册，no. 0235，第 750a 页。

③ 琉璃（vaidūrya）：梵语音译，亦作毗琉璃，佛教七宝之一，指青色宝。鸠摩罗什译《佛说阿弥陀经》载“金、银、琉璃、颇梨”，为汉文通行文本源头。出自姚秦 • 鸠摩罗什：《佛说阿弥陀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2 册，no.0366，第 347b 页。

④ 茉莉（mallikā）：梵语音译，早期佛经多写作“末利”，指印度香花。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中译作“末利”，宋代以后俗写为“茉莉”。出自唐 • 段公路：《北户录》卷三，中华书局，1985 年，第 49 页。

⑤ 菩提（bodhi）：梵语音译，意为正觉、觉悟。东汉支娄迦谶译经最早传入，后经鸠摩罗什《大智度论》阐释广为传播。出自姚秦 • 鸠摩罗什：《大智度论》卷十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25 册，no.1509，第 191b 页

⑥ 刹那（kṣaṇa）：梵语音译，表极短暂之时量。最早见于东晋佛陀跋陀罗、法显共译《摩诃僧祇律》，玄奘《大唐西域记》完善刹那、弹指、一念的时间体系。出自唐 • 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卷二，中华书局，1985 年，第 51 页。

⑦ 关于近代早期欧洲印刷品产量的增长，参见 Eltjo Buringh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Chart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in Europe, A Long-Term Perspective from the Sixth through Eighteenth Centuri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9, no. 2, 2009, pp. 409–445; Andrew Pettegree and Arthur der Weduwen. *The Bookshop of the World: Making and Trading Books in the Dutch Golden A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Margaret Spufford. *Small Books and Pleasant Histories: Popular Fiction and Its Readership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⑧ 段波、张瑞影：《达纳的航海叙事与海洋民族共同体想象》，《海洋文学与文化学刊》，第 1 期，2026 年，第 105–116 页。

⑨ 关于“主体间性”概念的使用，本文借用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术语，但赋予其文学批评层面的新含义，指创作主体与模仿对象之间既相联系又保持间距的关系。

⑩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情节、性格、思想、言词、歌曲、戏景”为悲剧六大元素。

⑪ 修昔底德，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286 页。

⑫ 伊恩·瓦特，高原、董红军译：《小说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1992 年

⑬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745 页。

⑭ 郭庆藩，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 年，第 922 页。

⑮ 桓谭，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中华书局，2009 年，第 1 页。

⑯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10 页。

⑰ 李白，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163 页。

##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 年。

[Ban, Gu.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vol. 30, "Treatise on Arts and Letters." Annotated by Yan Shigu.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段波、张瑞影：《达纳的航海叙事与海洋民族共同体想象》，《海洋文学与文化学刊》，第 1 期，2026 年，第 105–116 页。

[Duan, Bo and Zhang Ruiying. "Dana's Maritime Narrativ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American Maritime Community."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o. 1, 2026, pp. 105–116.]

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2004 年。

[Guo, Qingfan. *Collected Annotations of Zhuangzi*. Proofread by Wang Xiaoyu.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桓谭：《新辑本桓谭新论》，朱谦之校辑。中华书局，2009 年。

[Huan, Tan. *Newly Compiled Huan Tan's New Treatise*.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Zhu Qianzhi.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李广志：《东亚视域下的宁波海丝文化》，《海洋文学与文化学刊》，第 1 期，2026 年，第 127–138 页。

[Li, Guangzhi. "The Maritime Silk Road Culture of Ningbo from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no. 1, 2026, pp. 127–138.]

李白：《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Li, Bai. *Annotated Collection of Li Bai*. Annotated by Qu Tuiyuan and Zhu Jincheng.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Xie Defeng. Commercial Press, 1997.]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Song, Zhenhao. *Social Life History of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ies. Revised edi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4.]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1983 年。

[Wang, Guowei. "History of Song and Yuan Dram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Guowei*. Shanghai Bookstore, 1983.]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Wang, Yao. *Essays o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军译。三联书店，1992 年。

[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Translated by Gao Yuan and Dong Hongjun,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